他是“雄辩部长”，更是“杰出的宣传鼓动家”，被老师赞为“可以有大功德大前程的人”——

陈昌：毛泽东挚友兼助手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文隆

6月13日，浏阳市镇头镇，陈昌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前的陈昌烈士铜像。 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范远志 摄

骄阳似火，天高云淡。浏阳市镇头镇，浏阳河穿境而过，“章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的指示牌清晰可见。

陈昌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及墓地，掩映在土桥村成片油茶林的绿色海洋里。

陈昌，字章甫，浏阳镇头人，1894年出生，1930年牺牲。

1911年，陈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，与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蔡和森等结友。

他壮怀激烈的短暂革命生涯，也从这里开始。

学生时代就是毛泽东的挚友和早期革命活动助手

作为毛泽东的挚友和早期革命活动助手，陈昌也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。

在陈昌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，其侄孙陈大宏介绍说：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，陈昌是1911年至1915年，毛泽东是1914年至1918年。陈昌比毛泽东小半岁，但两人思想意识接近。”

1914年春，因学校合并，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。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独立思考、勇于进取的学习态度，以及善于交际、联系群众的活动能力，令陈昌极为钦佩。他们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

当时，蔡和森、何叔衡、罗学瓒、张昆弟等也在一师读书，且都通过毛泽东团结在一起。他们经常纵论天下大事，讨论国家命运和前途，并成立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思想、新文化，探求革命真理。

1915年，省内反袁声浪日益高涨，一师师生尤为积极，毛泽东有了组织团体、联合更多进步青年的想法。陈昌表示支持。

“二十八画生者，长沙布衣学子也。但有能耐艰苦劳顿，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，修远求索，上下而欲觅同道者，皆吾之所求也……”毛泽东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，陈昌积极响应，将启事张贴到长沙各学校。

陈大宏说，当时，毛泽东留下的通信地址是“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”。那时，陈昌已经毕业并任教于一师附小，“联系人就是陈昌，说明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”。

1916年上学期，陈昌受聘到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县五美高小执教。

他时刻怀念着省会的好友，常与毛泽东、蔡和森等通信，汇报思想和乡间浏阳的情况。

毛泽东得知浏阳是个历史悠久、人杰地灵、物产丰富、山川秀美的大县，便激动地对陈昌说：“贵县是非去不可的！”

1917年寒假，毛泽东在陈绍休陪同下，从长沙出发徒步到浏阳游学并进行社会调查。经永安、过江背，去了浏阳县城、澄潭江、文家市之后，毛泽东来到浏阳镇头土桥的陈昌家。好友重逢，倍感亲切。他们尽兴交谈，还专程前往陈昌就读过的金江高小参观，与部分教师座谈。

这个寒假，毛泽东在陈昌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两人每天都在一起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鲁迅1933年春写的一副联句，恰好形容了两人的革命情谊。

参加工作后一边从事革命活动，一边倡导教育改革

1918年4月，酝酿多时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，陈昌是“干事”之一。

一边从事革命活动，一边教书。陈昌把地理知识与时局结合起来，给学生讲解中国是如何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步步瓜分的。在自编的教材中，他呼吁：“尚志沙场，誓图恢复，山河依旧，不难一一收回，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，洗百年之奇耻也。”

一次在课上讲到上海时，陈昌说：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也是劳动人民的地狱。接着，他把地球仪转到莫斯科方向，说现在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就是莫斯科，然后便给学生讲述十月革命的情况。

1920年秋天，受毛泽东委派，陈昌回到浏阳，开办浏西文化书社。他选定母校金江高小为社址，除了推销各种进步书刊，陈昌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，免费送给贫苦知识分子阅读。毛泽东知道后，肯定了书社的成绩，特地送给书社一副梨木刻字版。

1921年，陈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春天，他回到浏阳金江高小教书。

他力主教育改革，启用新课本，整顿校风，要求学生不着长袍马褂，改穿布料短衫，还把数十亩校田辟为农场，要求师生从事劳动生产。

他带领师生，把学校周围杂草丛生的荒地修筑成环校马路，并自编一首修路歌：“修我们的马路，贯彻我们的精神，怕什么寒和暑，雨和风。拿起我们的锄头、铲子，快来做工。怕什么高和低，土和石。凡阻碍我们的，就要把它铲平！大家起来，做一个真正的劳工。”

开国上将宋任穷是陈昌在金江高小的学生。他曾回忆说，金江高小，言论自由，学风开放。他在一篇作文里写打倒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，老师竟将此文当作范文张贴出来。

陈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，是创办金江高等女子职业学校。当时，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。经陈昌倡议，金江高小卖掉了农场几百担积谷，筹措经费，创办女子学校。毛泽东得知后，竭力支持此事，并特派夏明翰的姐姐夏明森任女校校长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金江高小的带动下，浏阳大部分学校开始招收女生。

是“雄辩部长”，更是“杰出的宣传鼓动家”

在女儿陈文新的印象中，陈昌最大的才能是演讲和辩论。

陈文新听母亲说，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，陈昌的演讲才能就闻名全校。每日清晨，同学们常见陈昌独自跑到猴子石附近，面对湘江大声练习演讲。

他将滔滔江水视为千百群众，声音洪亮，说理辟透，顾盼神飞。常有路人驻足欣赏。因他是学校辩论会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，人称“雄辩部长”。

这一才能成为他革命工作的锋利武器。

1926年，北伐前夕，广东革命政府要争取境内民军参加北伐。陈昌被派往湘西贺龙驻地，动员该部出兵北伐。临行前，陈昌并没有把握，他对家里人说：弄得好就是一杯酒，弄得差就是一把刀。

当时，军阀孙传芳、吴佩孚也派代表同入湘西。贺龙设宴邀请三方陈述理由。陈昌发挥辩才，痛斥封建军阀对内残害人民，对外投靠帝国主义，并力陈革命主张。

最终，贺龙接纳了陈昌，率部移驻常德。陈昌是贺龙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。

1930年1月，陈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。途中，在澧县不幸被捕。敌人企图以高官厚薪拉拢他，遭严词拒绝；继而施以酷刑，他亦始终坚贞不屈，决心“献身党的事业，死而无憾”。1930年2月23日，陈昌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。

“临刑前，陈昌高呼：‘革命一定成功！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！’”陈大宏介绍，陈昌牺牲时36岁。

宋任穷撰文回忆，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，有一次在毛泽东处谈起陈昌、夏明翰，说他们是他在金江高小的老师，“毛泽东对陈昌、夏明翰的评价很高，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。”

喜欢写日记，被老师赞为“可以有大功德大前程的人”

在浏阳市档案馆，至今珍藏着一本署名“陈章甫”的《寸阴笔记》，用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蓝格笔记本。

笔记名取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”之意，有珍惜时光的用意。这其实就是陈昌日记。

在日记中，陈昌记录了他从一师附小任教放寒假在家闲居，到被徐特立聘为长沙县五美高小教师不足半年的日常情况。

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，早晨起来视天气情况，或进行野外运动，或进行室内锻炼，有起舞、习拳、呼吸、器械、体操等。一般上午练习毛笔字一大张，下午阅看《资治通鉴》辑览几十页，晚上练习《说文解字》部首十余字。

除了记录必修的学习功课外，也记工作、生活或劳动，包括会客访友、阅信复信寄信等日常琐事。

陈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曾评价他“多记行事所得”，称赞他日记的特点是“做事的收获记得多”，认为他是一个更重行动的人。

另一位黎锦熙老师甚至拿他与毛泽东相比较，认为“笃行两人略同，皆可大造”。

在1915年一个多月的暑假期间，毛泽东与陈昌都住进老师住的芋园，多次向黎锦熙老师请教读史方法、研究方法、读书自习方法和文字学知识等。黎老师在看了两人的日记后，记下了自己的感受，认为毛泽东文理优于陈昌，而在努力践行所学上，两人却大致相同，并预言两个人都是可以有大功德大前程的人。

陈昌学习非常刻苦，他在1915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近来在北溪草堂读书，朝去暮归，稍藉以习劳耳。自朝至昃未尝释卷，夜辄近三更。”

陈昌也非常注意身体，每天锻炼，增强体质。1916年3月16日记录，他早起练习了八段体操，并且记下了歌诀：“两手敬马理三焦，左右攀弓似射貂。健脾理胃须单举，五痨七伤返后瞧。两手撑拳生气力，十指攀尖固肾腰。大鹏展翅开胸次，坐马腾腾饮食消。”

毛泽东对陈昌妻女多有关怀，叮嘱其女继承遗志

“毛主席与杨开慧结婚时，我父母也帮着张罗。”陈昌女儿陈文新在追忆父亲时提及，“父母在长沙青山祠请了两桌客人，主席的婚姻大事就定了。”由此可见陈昌一家与毛泽东关系之亲密。

1930年秋，毛泽东带兵打长沙，陈昌的妻子毛秉琴还去见过毛泽东一次，并把陈昌牺牲的事情告诉了他，毛泽东听后十分悲愤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对陈昌的妻女多有关怀。

“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武汉大学读书时，1951年我毕业前夕在北京农科院实习，母亲委托我代她看望主席。我给主席写了信，主席派秘书接我到中南海。主席提到我父亲牺牲时说：‘你父亲是个好同志。’主席还为我题了‘努力学习’几个字。”

陈文新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。她考取了留苏预备班，写信告诉主席。主席派他的私人医生邀请陈文新去家中做客并合影。

第三次见到毛主席，是1957年在莫斯科。当时，毛主席借到莫斯科开会的机会，接见了包括陈文新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。

毛泽东也多次亲笔回复陈文新、陈云姊妹的来信，他写道：“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，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为人民为国家的建设服务。”

毛泽东还勉励她们进步并照顾好母亲，并总是深情地问候她们的母亲好，还曾汇去300元以作生活补助。

毛泽东对陈文新的鼓励，成为她一生从事农业的动力。

留学回国后，陈文新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一直从事土壤微生物学与细菌分类学研究。世界上第四个根瘤菌属，当时被命名为“中华根瘤菌”，它的发现者就是陈文新。2001年，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杰出革命英雄

缪伯英：

“既以身许党，应为党的事业牺牲”

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文

“既以身许党，应为党的事业牺牲，奈何因病行将逝世，未能战死沙场，真是恨事！”1929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不幸病逝，年仅30岁。病危之际，她仍心系党的事业。

初夏时节，记者从长沙市驱车60公里，来到了位于长沙县开慧镇飘峰山村枫树湾组的缪伯英故居。在山水环抱之中，这幢土木结构的平房显得静谧而清新。1899年10月21日，缪伯英就出生在这里。

缪伯英出生在书香世家，祖父办过私塾当过教书先生，父亲中过秀才还去日本留过学。受父亲影响，缪伯英从小立志“教育救国”，她于1919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，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（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）理化系。

在北京求学期间，缪伯英接触到李大钊，成为李大钊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她还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、邓中夏、高君宇等人，与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人生征程。

故居大厅内，有一面浮雕墙刻画了缪伯英一生中最重要的3个时刻。最左边是1920年，由李大钊直接发展入党的光荣时刻；中间是她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运动的历史场景；最右边的是她为了掩护丈夫何孟雄，扯下身上3粒外衣纽扣的感人瞬间。

在李大钊的引导下，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。她于1920年先后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早期党组织。1920年11月，21岁的缪伯英被吸收进了由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。

入党后，缪伯英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，向妇女发出“大家努力，向光明的路上走”的呼吁。1922年下半年，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长，随后被选为“民权运动大同盟”的筹备员，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。1923年2月，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，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，她秘密主持编印了《京汉工人流血记》等宣传品，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。缪伯英还先后任过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、湘区委第一任妇委书记等职。

1927年8月，缪伯英前往上海，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。一天，缪伯英随何孟雄前往秘密联络点时，遭暗探跟踪，紧要关头，她迅速扯下身上的3粒外衣扣子，塞到何孟雄手中，并推他先走，自己则引开暗探，跳进溪流隐藏，等待敌人离开之后才得以上岸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缪伯英湿寒入体，从此重病不愈。

由于斗争环境险恶，食无定时，居无定所，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，缪伯英积劳成疾，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。

誓言无声

——我党隐蔽战线百年斗争秘闻

熊瑾玎：

营财不为身 赤诚见肝胆

熊瑾玎（资料图片）

文|虢安仁

【名片】

熊瑾玎（1886-1973），湖南长沙县人。1919年参加“五四运动”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，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。1928年4月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会计，开办商号、钱庄、布店、绸厂、印刷厂，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开展工作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总经理、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等职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《晋绥日报》副经理、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、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，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没钱为女儿看病的富商阔太

1940年的一个冬夜，重庆。

在一家医院里，医生一边给一个半岁大的婴儿检查，一边对旁边心急如焚的父母说：“10块大洋。”

丈夫眉头紧蹙，妻子手插进口袋，却只有2块大洋。望着高烧昏迷的女儿，夫妻俩苦苦央求医生，希望他大发善心，救孩子一命，但医生坚持说：少一个子儿也不行！

这对衣着光鲜的“老板”和“老板娘”正是熊瑾玎和朱端绶，看上去像富商阔太，但这一身“行头”却是穿给外人看的。

从1928年春开始，党中央任命熊瑾玎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，负责为党管理和筹措经费。他主持开办了3家酒店、一个钱庄，还与人合伙经营了印刷厂、织绸厂、洋货店、大型布店……是名副其实的“老板”。从1938年开始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，熊瑾玎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，并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财务工作。

而“老板娘”朱端绶，也管着一个钱袋子，她是新华日报社的会计科科长。这些年，他们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，但夫妻俩有着共同的默契：公私分明，生活再难，公家的钱绝对不能动！

文章开头那一幕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结尾：他们的孩子因辗转路途，耽误了及时治疗，最终不幸夭折，成了夫妻俩心中永远的痛。

戏院隔壁开布店的“熊老板”

1928年的一个平常夜晚，上海。

成立于1925年的远东第一戏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天蟾舞台，台上的花旦莺喉流转娇如水，台下的戏迷如痴如醉，激动地给后台送花篮，阵阵喝彩声一直传到大街上，传到隔壁的“福兴商号”里。

隔壁，商号的熊老板正“噼里啪啦”打算盘，仔仔细细地把每一笔账目登在账簿上。谁会想到，这上面的每一笔收入竟然都是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。

窗外，警车呼啸而过，“熊老板”警惕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，又向窗外看了看，听到警笛声渐渐远去，他又继续埋头打算盘。在客厅中央的大桌子上，摆着一些布匹，一群穿长衫、戴礼帽的“商人”正在谈“生意”。如果在讨论中有人进来，开会的人就会装作看货议价的样子，就布匹的买卖讨价还价。在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张小条桌，这是会议记录员坐的地方。

这栋房子最令“熊老板”满意的地方，就在于它位于天蟾舞台的后面，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直接到二楼房间，而不必经过楼下生黎医院的房子，万一出事可以从楼梯撤退出去，混入来往的市民之中。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。1928年4月，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，熊瑾玎离开武汉，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。李维汉便让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，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。同时，李维汉交给他一个任务：找个合适的地方，建立起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。

熊瑾玎以商人的身份四处查看，经过千挑万选，最终看中了云南路447号的二层楼房（今云南路171号至173号处），经过观察和考察，中央也非常满意。进出这所房屋要经过一条不起眼的小巷，巷子里比较脏乱，一般人不大从这里经过。房子的全部楼面共有三间，一间面积较大可作客厅，能容纳10余人，其余两间一间当卧室，另一间堆放杂物兼厨房。楼下是一个周姓医生开设的“生黎医院”，每天都有人来看病，也可作为来往地下党员的掩护。

租好房子后，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“福兴商号”的招牌，经营湖南纱布。而此后的40余年，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直亲昵地称他为“熊老板”。

办报有方的《新华日报》“总经理”

“新华扫荡中央，新华扫荡中央了……”

抗战时期，陪都重庆，听到这几声，就知道报童叫卖的是《新华日报》。

“扫荡”指《扫荡报》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；“中央”指《中央日报》，国民党的机关报，这两份报纸与《大公报》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。

而《新华日报》在武汉创刊刚满一个月，销售量就达2万余份，最盛时约5万份。国外很多新闻机构都将《新华日报》的报道用作权威消息。《新华日报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，1938年元月在武汉创刊，至1947年2月在重庆被查封，历时9年。报纸从出生到终结，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，被誉为“插在国统区的红旗”。在报童和群众口中出现“新华扫荡中央”的排序，其寓意不言自明。

按照党组织安排，熊瑾玎自创刊伊始就担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经理。为践行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报纸的要求——“编得好、印得清、出得早、销得多”，为建立、巩固和发展好这个宣传阵地，为使《新华日报》在激烈竞争中迅速打开局面，熊瑾玎想了很多办法。从创刊之日起，就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发行网。还在长沙、郑州、洛阳、宜昌、黄陂等地相继设立了分销处，并在报馆内增设服务科，为读者代购邮寄各种图书杂志。由于熊瑾玎经营有方，《新华日报》创刊后不久，发行量就迅速攀升，甚至有超越《大公报》的架势。

在武汉被日军攻陷前夕，《新华日报》被迫迁到重庆。熊瑾玎解决了报馆的馆址、纸张供应和经费问题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正因为熊瑾玎贡献巨大，半个世纪以后，一些老新华人说：“没有熊老，《新华日报》可能早早就被反动派当局从经济上扼杀了。”

报馆从武汉迁到重庆后，熊瑾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将报纸赠阅的数量减少到300份，并指示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加大招揽广告业务的力度。他说：“广辟广告来源，不仅能增加收入，还可广交朋友，扩大统一战线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。”

在他的精心指导下，报馆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势力、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，首先从四川地方工商业打开局面，争取到商号、银行及烟草公司的广告业务。随着广告业务的扩大，经济收入也日益增多。

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熊瑾玎夫妇：出生入死，贡献甚大，最可信赖。

主要参考文献：

《红色伉俪传奇人生》熊畅苏 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熊瑾玎：“最可信赖”的“红色管家”》韩晓青《学习时报》2020年10月19日